

我国社会性 财政支出的 效果评价

宋美喆 / 著

WOGUO SHEHUIXING
CAIZHENG ZHICHU DE
XIAOGUO PINGJIA



四川大学出版社

我国社会性

财政支出的

效果评价

WOGUO SHEHUIXING
CAIZHENG ZHICHU DE
XIAOGUO PINGJIA

宋美喆 /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梁平
责任校对:周艳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国社会性财政支出的效果评价 / 宋美喆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614-9916-0

I. ①我… II. ①宋… III. ①财政支出—研究—中国
IV. ①F8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5377 号

书名 我国社会性财政支出的效果评价

著者 宋美喆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号 ISBN 978-7-5614-9916-0
印刷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张 6.75
字数 184 千字
版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 1 章 绪 论	(1)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6)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思路	(25)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29)
第 2 章 社会性支出及其效果评价标准	(33)
2.1 社会性支出的概念及结构	(33)
2.2 我国社会性支出的历史演变	(36)
2.3 社会性支出效果的评价标准	(43)
2.4 效率与公平的互动关系	(61)
2.5 本章小结	(65)
第 3 章 社会性支出的起点公平性评价	(67)
3.1 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及指标体系的建立	(69)
3.2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综合指数的合成	(71)
3.3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收敛性检验	(78)
3.4 本章小结	(89)
第 4 章 社会性支出的结果公平性评价	(92)
4.1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及变动趋势	(93)
4.2 转移性支出在调节城乡收入分配结果公平上的效果 评价	(106)

4.3	社会性支出在调节城乡收入分配结果公平上的效果评价	(120)
4.4	本章小结	(134)
第5章	社会性支出的效率评价	(137)
5.1	社会性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假设的提出	(138)
5.2	社会性支出与经济增长基准回归模型的建立	(142)
5.3	样本数据及指标说明	(145)
5.4	社会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148)
5.5	本章小结	(154)
第6章	同时考虑效率与公平的社会性支出效果的综合评价	(156)
6.1	基准回归模型的建立	(157)
6.2	数据及指标说明	(162)
6.3	模型内生性检验	(166)
6.4	模型的可识别性	(168)
6.5	模型参数的估计	(170)
6.6	本章小结	(178)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181)
7.1	本书结论	(181)
7.2	政策建议	(185)
7.3	后续研究及展望	(190)
参考文献	(192)

第1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工业革命以来，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生根发芽，市场就像一只充满魔力的手，为各国经济发展和福利增长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市场经济在全球经济体中的成功，市场是有效配置经济资源的手段，已成为各国的普遍共识。然而，硬币总有它的两面。自市场经济诞生起，经济呈现周期性衰退现象就成为市场经济国家挥之不去的噩梦。为了应对衰退给经济带来的巨大损失，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皓首穷经，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其中，以凯恩斯主义运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弥补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缺陷的思想最为瞩目，成为市场经济国家抵御经济波动，熨平经济周期的主要理论武器。凯恩斯认为，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趋向不足，因而政府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实施有效的需求管理政策刺激经济，在经济不景气时用政府财政支出这只强有力的手给市场一个适当的推力，可以使市场这架怠速的机器重新高效运转起来。

随着凯恩斯主义通过财政支出来管理需求的政策实践在各国的展开，关于社会财富应如何配置的争论也应运而生，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叶几乎同时兴起。

福利经济学关注的是在既定的社会财富总量下，财富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庇古认为，在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不论初始资源如何配置，市场交易都可以自动实现瓦尔拉斯均衡，同时社会福利也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然而，“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一个强条件，现实经济社会中大量存在的是非完全、非有效的竞争，甚至是完全垄断市场。因此，卡尔多、希克斯和西托夫斯基等学者在庇古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如果任何改变导致一部分人福利增加而另一部分人福利损失，只要增加的福利足以补偿受损的福利，那么这种改变也是有效率的。这种改进被称为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它是现代福利经济学衡量社会变革效率的重要标准，亦即卡尔多·希克斯标准。

事实上，卡尔多·希克斯标准涉及两个重要内容。一是社会福利总量的增加，即“经济效率”的问题；二是社会福利的分配，也就是“社会公平”的问题。在政府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管理社会经济的背景下，通过政府财政支出调节经济部门和经济主体的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财政支出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即政府应如何合理安排有限的财政资源，使之同时达到既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又满足社会公平的目的。

按财政支出的性质划分，财政支出可分为经济性财政支出（以下简称经济性支出）、社会性财政支出（以下简称社会性支出）、服务性财政支出（以下简称服务性支出）三大类。其中，经济性支出是政府用于经济发展方面的支出，以对经济活动的补贴支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为主；社会性支出是与民生直接关联的支出，以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为主；服务性支出是政府维持日常活动和国家安全的支出，以国防支出、政府行政管理支出为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规模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化整

体上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截至 2012 年末，我国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已达到 24.2%，成为社会总需求的三大支柱之一。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转型的关键时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产业工业化的指引下，政府财政长期以来“重投资、轻服务”，财政支出格局带有浓厚的“建设财政”特点，各级政府普遍形成了以 GDP 绝对量的增长为中心的政绩观，财政支出被大量用于竞争性及营利性的经济性支出方面，过多地介入本应由市场力量发挥主导作用的领域。从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来看，经济性支出一直都是我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其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更是备受青睐。与此同时，社会民生领域的支出却相对不足，在财政支出中，社保、医疗、教育的开支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相关支出，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发展严重失衡。例如，自 2008 年下半年起陆续实施的 4 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中，各级财政用于基础设施、节能减排、灾后重建、结构调整、农村建设等方面的支出高达近 3 万亿元人民币，约占总支出的 3/4，而用于教育、卫生、科研、社会保障等社会领域的支出仅占总支出的 1/4。

片面追求经济数量上的增长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造成我国资源配置效率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平衡、不协调，社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居民收入差距不断被拉大，贫富差距悬殊。这种以国富与民生关系严重失衡为特征的经济畸形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积累的潜在经济、政治风险，成了制约我国经济转型和社会进步的突出障碍，引起了理论界及实务界的广泛重视。人们开始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它仅仅是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手段之一，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应当是让最广大社会成员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只有产出的增长而没有公平公正的分享、没有民生福利的增长，并不是真正的增长。

按照国际经验，人均 GDP 超过 1000 美元之后，经济增长机制

会发生重要转变，开始进入一个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剧烈变化的时期。在此阶段，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以及技术创新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需求开始快速扩张。这一阶段既是发展的黄金期，又是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能否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具有包容性，即是否倡导机会公平的增长，社会是否稳定，社会和经济是否处于一种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状态。而社会性支出则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举措，提高社会性支出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提高财政支出的公平正义性，才能真正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国人均 GDP 已超过 4000 美元，真正进入了国际公认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正处在从一般温饱型社会向和谐发展型社会过渡、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就我国目前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区域发展不协调等现实矛盾而言，加大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科技教育等社会事业领域的投入已成为一种强烈的现实需求。同时，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职能也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社会性支出比重分不开。衡量一个政府是否称职，不仅要看财政收入的来源及途径，更要看财政支出的用途是否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为目的，政府只有通过提供优质充足的社会公共服务才能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

实现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转型，将财政支出的重点由经济性支出领域转移到社会性支出领域，重视民生领域的建设，关系到我国政府的职能是否能够实现，关系到我国财政支出是否能与经济增长形成良性互动局面，关系到我国经济与社会间是否能够平衡发展。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已成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共识，并成为现阶段政府工作的目标和重点，政府强调财政支出的公平正义的政治意图也日趋明显。近年来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政协）的提案来看，民生为其中的热点，是最热议题之一，这从侧面说明了民生问题已成为

我国转型期诸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系统提出了改善民生的价值理念，设定了“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民生建设目标。2011年政府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民生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当前我国政府已意识到强化社会性支出的重要性，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缩经济性支出，加大对社会事业领域的投入，试图扭转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的现状。但当前我国社会性支出的支出效果到底如何，是否实现了政府的财政职能，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良性互动，目前还没有研究涉及。因此，以社会性支出作为研究对象，对我国政府社会性支出的效果进行评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理论方面，其有利于充实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财政理论，有助于厘清我国社会性支出应遵循的原则和目标，有望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性支出的理论体系，为我国解决社会民生问题和实现经济增长找到理论上的契合点，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实践方面，其有助于政府部门发现当前社会性支出中的薄弱环节和存在的矛盾，防止和克服社会性支出领域内一些不正常现象的出现或蔓延，明确财政改革方向。政府部门可以此为依据编制本级政府预算，规划社会性支出的规模及方向，形成更加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这不仅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增长，更有助于实现我国社会的公平及稳定，进而推进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现有研究多将研究对象界定为财政支出总体，考察其与经济增长及收入分配的关系，极少有研究将其中的社会性支出单独作为研究对象。在财政支出调节收入分配公平的效果方面，有部分学者重点对其中的转移性支出进行了考察，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转移性支出是否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因此，本书从现有研究的发展脉络出发，从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转移性支出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三大方面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1.2.1 财政支出与收入分配公平的关系研究

国外方面，Boyd (1988)^[1] 利用 OLS 方法得出结论，在较高的经济水平上，政府转移性支出、国防支出对收入不平等有负向影响。Barro (1990)^[2] 实证分析了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前增加支农支出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此后进一步增加支农支出则会阻碍农业经济的增长，不利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Galor 等 (1993)^[3] 指出，在初始收入分配情况既定的条件下，政府提高教育支出，能够增加贫困居民受教育的机会，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Clements (1997)^[4] 以巴西为例，实证检验了包括财政支出在内的一系列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支出、健康支出及社会保险支出会使收入不平等状况进一步恶化。Farre (2000)^[5] 以收入的对数方差来反映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以受教育年限的方差来反映教育不平等的程度，证明了在总体中初始收入和教育收益率相同的假设条件下，收入不平等是教育不平等的线性函数，教育不平等会引起收入不平等程度

的扩大，政府教育支出的增加会加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Sylwester (2002)^[6] 实证得出结论，教育支出可以缩小收入差距，当加入控制变量后，结果依然稳健。Zhang (2002)^[7] 研究发现，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富人越容易掌握政治资源，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利，政府支出会引起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进一步扩大。Gregorio & Lee (2002)^[8] 基于 1960—1990 年大量国家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教育机会的公平对收入分配的公平起着重要作用，政府社会性支出有助于收入分配公平的实现。Dunn 等 (2005)^[9] 基于 1987 年美国 48 个州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支出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并认为在控制公共服务水平后，收入不平等和国防支出间的正向关系被减弱。Leonel 等 (2011)^[10] 采用 1972—2006 年 43 个中上收入及高收入国家的相关数据，通过实证得出结论，不同的财政支出具有不同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其中政府投资性支出可以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同时，不阻碍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这与 García-Peñalosa 等人 (2007)^[11] 的研究结论一致。Jorge 等 (2012)^[12] 以 1970—2006 年 150 个国家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社会福利支出、教育支出、健康支出及公共住房支出占 GDP 的比重越高，对收入不平等的抑制效果越好，以上支出能有效调节收入分配。

国内方面，高展军等 (2005)^[13] 分析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出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正相关。周峰等 (2006)^[14]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基于 1997—2003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支农支出比重的提高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科教文卫事业支出比重的提高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基础建设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李秉强 (2007)^[15] 采取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增加会促使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在收支平衡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政策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不显著。钟宁宁 (2007)^[16] 认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与财政支出有很大的关系，我国存在着二元财政，财政支出向城镇地区倾

斜。王莉 (2007)^[17] 实证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出对社会公平的影响, 由实证得出结论, 财政支出规模扩大了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 其中福利救济和补贴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起到一定作用, 而增加农业支出和教育支出会引起社会不公平程度的提高。高彬彬 (2008)^[18] 以山东省为例, 实证检验了作为居民收入调节重要手段的财政支出是否发挥了其职能, 并认为虽然财政支出有很大增长, 但由于财政支出在体制上存在缺陷, 导致支出结构不合理, 过度向城市地区倾斜, 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 从而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潘辉 (2009)^[19] 利用 1978—2007 年的相关数据, 基于 VAR 模型检验了财政支出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在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上的职能发挥不佳, 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了负面效应。孟勇 (2009)^[20] 通过建立分位数回归模型得出结论, 财政支出的增长与居民收入的增长并不同步, 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更为明显些, 同等数量的财政支出, 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拉动作用要高于农村居民, 由此财政支出的增长会带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蔡忠雁 (2009)^[21] 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 对 1997—2006 年我国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检验, 他认为我国财政支出应从效率向公平倾斜, 目前财政支出应加大科教文卫支出和支农支出的力度。王艺明等 (2010)^[22] 基于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 通过构建计量模型, 实证考察了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研究发现不同财政支出项目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不同, 且存在地区差异, 其中基础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和社会福利保障支出在全国层面上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向相关, 对于西部地区, 这些财政支出项目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在东部地区却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莫亚琳等 (2010)^[23] 构建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模型, 利用 1995—2006 年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 得出结论, 城乡二元结构下政府提高财政支出将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各类财政支出中, 只有财政支农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比重的提高, 才会改善当地收入分配状况, 而基础建设支出、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支出、科教文卫支出与

行政管理类支出比重的提高,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李吉雄(2010)^[24]从投入产出的视角,考察了我国财政进行收入再分配的状况,最终认为在财政的支出结构中,能起到缩小收入差距作用的支出比重较低,加上财政运行的高成本,造成我国财政再收入分配能力不断下降,财政在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上的效用不显著,财政未能较好地发挥收入再分配的职能。陈安平等(2010)^[25]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 System-GMM 估计方法的研究表明,即使财政支出总量增加,城乡收入差距也未必会缩小,只有倾向于农业投入和科教文卫支出增加的财政支出结构才能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秦海林等(2011)^[26]从我国二元的财政政策入手,提出了二元财政政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假设,并基于1957—2009年的时序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我国财政支出非但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而会使情况恶化。金双华(2011)^[27]从财政支出的角度,利用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等指标对我国不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其后果进行了统计评价,结果显示,本应是缩小收入差距的福利性支出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是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杨维忠(2011)^[28]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选取我国31个省市1998—2008年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各项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结论,支农支出可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教育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多会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邓旋(2011)^[29]基于我国1995—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财政支出规模及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财政支出显著地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同项目的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农林水务支出起到了调节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而公共安全支出及社会保障支出的受益范围主要为城市,不利于城乡间收入差距状况的改善。李建强等(2011)^[30]利用VAR方法,对1978—2008年我国城乡基尼系数、城乡泰尔指数以及城乡人均实际收入比分别与历年各项公共支出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当前我国经济性支出、维护性支出甚至社会性支出的增加都拉大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财政支出在调

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方面起着累积效应。张义博等 (2012)^[31] 基于 1996—2006 年省级面板数据及 1995 年、2002 年的 CHIP 微观数据,运用宏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得出结论,科教文卫事业费和转移性支出等财政支出具有明显的城市倾向,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廖信林 (2012)^[32] 根据 1978—2009 年全国的时序数据,应用 SVAR 模型对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理论模型和实证结果都表明,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背景下,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产生正向冲击,过分偏向城市的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产生正效应。刘晓凤 (2012)^[33] 以 1978—2010 年湖北省的统计数据为例,运用 VAR 模型对财政教育支出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分析表明,湖北省义务教育支出与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之间存在长期的正相关关系。王珍 (2012)^[34] 基于我国 1978—2010 年的相关数据,实证得出结论,除了政策性补贴支出显著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外,财政支农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教育支出反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财政支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可以看到,国内外学者对财政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大部分研究都侧重于实证分析,其中利用了面板数据模型、VAR 模型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其基本观点为我国财政支出总体规模的增长并没有实现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功能,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有限,应进一步加强改善。从财政支出结构的研究结果来看,不同类型财政支出影响收入分配的机制和方向是不一样的,各类财政支出在实现社会公平上的表现不同,财政支出结构亟待优化。

1.2.2 转移性支出与收入分配公平的关系研究

部分学者对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转移性支出进行了研究。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 1928 年出版的《财政学研究》一书中,把国家经费分为真实经费和转移经费两种类型。真实经费主要用于邮

政、军队、煤气和教育等方面，即通常所说的购买性支出；转移经费主要用于支付抚恤金、养老金等方面，这部分经费直接表现为资金无偿的单方向转移，即通常所说的转移性支出，转移性支出体现了政府非市场性的再分配活动。

关于转移性支出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转移性支出不能起到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作用，其中以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及哈耶克等人为代表。古典经济学中，亚当·斯密将经济理论建立在“经济理性人”假设之上，他认为经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经济人能够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国家对贫困和福利的关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李嘉图认为政府的转移性支出政策不但不会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改善穷人的贫困状况，而且还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使穷人状况恶化。马尔萨斯认为，国家之所以存在贫困现象，其原因在于人口的过度增长。政府所实施的福利救济政策，会让那些超过社会正常承载量而过剩的贫困人口得以存活并繁衍，导致在业工人失业概率的增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中，弗里德曼抨击了政府的社会保障计划，认为政府转移性支出的真正受益者通常为较富有的人，而穷人的福利增量有限，从而导致社会贫困问题加剧。哈耶克也对政府的转移性支出制度持批判态度，他认为，政府的再分配制度是通过个人的强制实施来完成的，会威胁到个体自由，并且容易导致个人对政府的依赖，政府的再分配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诺齐克为洛克的自然权利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他强调个人对财产和利益的所有权，认为个人财产不可侵犯，国家的主要目的为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并指出最弱意义国家是能够证明的功能最多的国家，他反对“分配的正义”观念，认为分配命令的发出侵犯了个人权利。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提出了“福利相对性”的概念，他认为福利是相对的，贫困也是相对的，不但否定了收入均等化的措施，还否定了提高国民收入的意义。在其观点中，福利与个人收入无直接关系，缩小国民间收入的差距和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政策都不能增

进社会福利水平。Garcia-Milà 等 (2001)^[35] 通过比较欧盟和西班牙中央政府对西班牙 17 个地区转移性支出前后的经济绩效,得出结论,转移性支出对改善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没有明显效果。黄祖辉等 (2003)^[36] 选取了 1993—2001 年各省的相关数据,运用 GE 指数进行了相应分解,从转移性收入角度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我国政府转移性支出并没有缩小收入差距,反而使农村内部、总区域及城乡间的不平等程度有所提高,尤其是明显提高了总区域和城乡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杜鹏 (2004)^[37] 以东北地区城镇居民为例,将转移性收入引入收入差距的测度框架,发现政府转移性支出并没有成为缩小收入差距的手段,反而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尹永钦 (2005)^[38] 结合我国财政转移性支出的具体实施情况,分析了转移性支出的效应,他认为当前财政转移性支出并没有有效扭转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及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张明喜 (2006)^[39] 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分析了分税制改革以后转移性支出与地区收入差距的关系,得出结论,在全国范围内转移性支出并没有达到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效果,其中以中部和西部地区表现最为突出。匡导球 (2006)^[40] 认为转移性支出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我国财政转移性支出制度还不完善,离规范化、体系化还有较大差距,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徐建中等 (2006)^[41] 根据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得出,城乡工资收入比、城乡经营收入比、城乡转移收入比和财产收入比均是引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其中城乡经营收入比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城乡转移收入比。邓佳等 (2009)^[42] 以 1995—2006 年中部地区 8 个省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政府财政转移性支出作为研究样本数据,运用计量方法得出结论,转移性支出对中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没有明显作用。张万强 (2009)^[43] 以 1997—2006 年辽宁省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分析了转移性支出对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及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的影响,经研究发现,转移性支出扩大了居民的收入差距,且在城乡居民间、城镇居民内部